

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

王炳照

—

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有悠久的历史。商周时期,就曾盛行“保傅之教”;汉唐之际,蒙学教育更广泛推行于宫廷王室和达官贵人家庭;宋元明清又有进一步发展,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相当程度的蒙学教育。所谓“养正于蒙”(《周易传义大全》卷三)、“蒙以养正”(《周易注》卷一)、“教子婴孩”(《周易本义通释》卷二)、“早教教”(《大戴礼记》卷三),都是主张在儿童性情未定之时和心智蒙开之际,就要施以正当的教育,以培育儿童的品德,启迪儿童的智慧,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,健康地成长。

为了顺利地实现蒙学教育的目标,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蒙学读物的编写和选用。

中国最早的蒙学读物是字书《史籀篇》,据说是“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秦代李斯作《苍颉》七章,赵高作《爰历》六章,胡毋敬作《博学》七章,其“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

汉代,“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,断六十字为一章,凡五十五章,并为《苍颉》篇。武帝时,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,无复字。元帝时,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。成帝时,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,皆《苍颉》中正字也,《凡将》则颇有出矣。至元始中,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,各令记字于庭中,扬雄取其有用者,以作《训纂篇》,顺续《苍颉》,又易《苍颉》中重复之字,凡八十九章。臣(班固自称)复续扬雄作十三章,凡一百二章,无复字。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有多种蒙学读物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:除《急就篇》之外,有蔡邕撰《劝学》一卷,晋著作郎束皙《发蒙记》一卷,晋散骑常侍顾恺之《启蒙记》三卷,更有流传甚久且广的梁朝周兴嗣所撰《千字文》一卷。此外,还有《杂字指》、《俗语难字》、《杂字要》等多种字书,可惜多已佚亡。

唐代有三种蒙学读物引人注意:一是《开蒙要训》,二是《太公家教》,三是《兔园策(册)》,也称《兔园策府》,

据罗振玉考证：“此书盛行于五代，或至宋季尚存。”（罗振玉：《兔园策府 残卷提要》，《鸣沙石室佚书》）

宋、元、明、清的蒙学读物有更大的发展，种类繁多，特色鲜明，影响也更为深广。综合性蒙学读物，以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为代表，统称“三、百、千”。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，大多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，主要有《性理字训》、

《小儿语》、《续小儿语》、《名贤集》、《增广贤文》等。历史知识类的蒙学读物，有《十七史蒙求》、《叙古千文》、《小学》、《童训》、《少仪外传》等。诗歌类蒙学读物，有《训蒙诗》、《小儿诗礼》、《童蒙须知韵语》，尤其是《神童诗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流传最广。专讲成语典故、名物制度常识的，有《名物蒙求》、《龙文鞭影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。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，如《女小儿语》、《女论语》、《改良女儿经》、《女四书》（包括《女诫》、《女论语》、《内训》、《女范捷录》）等。

直到清末民初，新式学堂已经创办，新型教科书编辑出版多年之后，传统蒙学读物仍在流传不止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，甚至出现多种扩充或改写的蒙学读物在民间传诵。如：《三字千字文》、《万字文》、《千家姓》、《重订三字经》等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钟情于

传统蒙学读物的人日渐减少，总的态度已今非昔比了。也有人试图借用传统蒙学读物的形式融入现代知识和新教育的内容，做所谓“旧瓶装新酒”的努力，终因时代的进步，新教育的发展，无可奈何而徒劳无功了。

二

传统蒙学读物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

化教育遗产，值得珍惜。清末民初，随着新式教育的诞生和发展，新型教科书的出版和采用，传统蒙学读物逐渐退出中国教育的舞台。五四运动时期，传统蒙学读物连同四书五经一起被视为封建旧文化、旧教育的糟粕，列入应被清除的文化教育垃圾的范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传统蒙学读物更长期远离文化教育界的视野，被



尘封搁置于图书馆的角落里，难得有人再觅其踪影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的“批林批孔”、“评法批儒”运动中，在“四人帮”的精心策划下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神童诗》、《名贤集》、《女儿经》等六种蒙学读物被宣判为“鼓吹复辟，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读物”，演出了一场“批判六种黑书”的滑稽闹剧。然而，历史的逻辑和客观规律却与“四人帮”的主观愿望相反，对六种蒙学读物的批判，直接暴露了他们毁灭文化、摧残教育的反动面目，也使长期被遗忘

的传统蒙学读物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改革开放后 有些研究蒙学读物的人 正是在批判蒙学读物时接触到蒙学读物 并对蒙学读物产生了浓厚兴趣的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“蒙学热”似乎持续不断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蒙学读物大量出版。有的刊行单篇,有的丛辑数种;有的略加注释,有的译成白话;有的为了研究,有的则为了营利。形式多样,动机各异。对于“蒙学热”或“蒙学读物热”,社会反应不一。支持者、赞赏者有之,反对者、谴责者也有之,多年来,各陈己见,各有所据,可谓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。

1985年,周谷城先生在为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《传统蒙学丛书》所写的《序》中,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。他说:“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《传统蒙学丛书》,我极表赞成。因为这是一件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。”他又说:“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,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、神道观、伦理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、历史观,在这类书中,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,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”;“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,为社会长期接受,在传授基本知识,进行道德教育,采取易于上口、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,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,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,仅仅在这一点上,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。”

周谷城先生特别强调蒙学读物所特有的研究价值,是极富深意的,也应该

成为我们研究蒙学读物、发掘其现代价值的指导性原则。

研究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。通过研读蒙学读物可以获得丰富而具体的教育发展史资料,特别是可以了解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状况,更可以探讨蒙学教学的规律和蒙学读物编写的经验。

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,编写经验极其丰富,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,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第一,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紧密结合。有些蒙学读物侧重知识教学,甚至重点在教识字,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品德要求,如《千字文》,全书千字,四言叶韵,共二百五十句,无一重字,以识字为主,又包括了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动植物名称和农业知识等,也涉及道德品质的修养;“女慕贞洁,男效才良。知过必改,得能莫忘。罔谈彼短,靡恃己长”;“景(影)行维贤,克念作圣。德建名立,形端表正”。有些蒙学读物侧重品德修养,又尽量充实知识的含量。如《三字经》,三字成句,文字简练,概括极强,通俗易懂,便于记诵。先讲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,接着讲伦理道德规范,又囊括了多方面的知识,诸如名物常识、历史变迁、朝代更替、帝王兴废、经史子集、日用知识,一应俱全,被誉为“千古一奇书”,成为一部集萃古代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。

第二,巧妙精准地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,提高蒙学读物的易读易记性。中国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是音、形、

义结合,蒙学读物多用韵语,读来朗朗上口,听来铿锵悦耳。许多蒙学读物几近白话,吸收许多民间流行的成语、谚语、俗语,通俗易懂,切于实用。如《三字经》: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义”;“养不教,父之过;教不严,师之情”;又如《千字文》:“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”;“上和和睦,夫唱妇随;外受傅训,入奉母仪”;再如《增广贤文》:“路不行不到,事不为不成;人不劝不善,钟不打不鸣”;“人老心未老,人穷志未穷”;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。这些都成为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口头禅。

第三,力求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,提高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。蒙学读物的选材特别注意浅显易懂,形象具体,生动活泼,贴近生活,大量选取历史故事、典型人物、民间传说、流行趣事。如《三字经》:“昔孟母,择邻处;子不学,断机杼”;“香九龄,能温席”;“融四岁,能让梨”;又如《弟子规》:“年方少,勿饮酒;饮酒醉,最为丑”;再如《增广贤文》: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世上新人赶旧人”;“美不美,乡中水,亲不亲,故乡人”。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,极易引发儿童爱读、乐读的积极性。这是蒙学读物编写者为后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经验。

第四,社会名流和著名教育家、学问家亲自动手编写蒙学读物,有利于保证蒙学读物的高质量高水平,有助于提高蒙学读物的声誉和权威性,扩大其社会影响。历史上,编写蒙学读物者,有不少高官,如李斯、赵高、胡毋

敬、司马相如、史游、李长等,又有不少大学者,如扬雄、班固、蔡邕、束皙、周兴嗣等,更有许多教育家,如朱熹、吕祖谦都曾编撰过蒙学教材。流传久远而广泛的《三字经》出自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之手,其他蒙学教材也多出自当时有相当地位或学有成就的人之手。

第五,蒙学读物要相对稳定,内容又要随时修订、增补和更新。在教育实践中效果明显的读物要力求稳定,使社会和家长、子女建立起对读物的信任感。如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经》等,连续使用数朝数代,沿用数百年至千余年,但内容又不断修订、增补和更新。《三字经》经多次增补,还新编多种《三字经》;有《昔时贤文》,又有《增广昔时贤文》;有《女儿经》,又有《改良女儿经》。正是由于不断修订、增补和更新,才保持了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;也正因为保持了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,才提高了更新后的蒙学读物的权威性和信任感。蒙学读物编写和使用方面的这些经验,十分值得人们重视。

毋庸讳言,传统蒙学读物,特别是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偏重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,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说教。书中神权、君权、父权、夫权四大精神绳索一应俱全,有的十分露骨,有的比较隐晦,必须细心辨识,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,清除其封建糟粕。尤其是当青少年及儿童阅读时,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更要负责地加以指导,避免消极影响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)